

国际政治理论与中日历史问题^{*}

于铁军

【内容提要】 2000年以来,围绕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撰的初中《新日本史》教科书的审定和出版,以及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数度参拜靖国神社,历史问题再度成为中日关系的焦点之一。本文从层次分析、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观点出发,试图对中日历史问题久拖不决的原因,以及解决或者缓和中日历史问题的途径提供某些解释。

【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 中日历史问题

【作者简介】 于铁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博士。邮编:100871。

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痼疾,严重影响和制约着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2000年以来,围绕由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撰的初中《新日本史》教科书的审定和出版,以及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数度参拜靖国神社,历史问题更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个焦点。在日本,一些重要的报刊杂志,如《朝日新闻》、《产经新闻》、《中央公论》、《世界》等都围绕中日历史问题展开了专门的讨论。在中国,除了官方发表的严厉谴责之外,也出现了一些关于该问题的学理性的探讨,譬如在中国知识界相当有影响的《读书》杂志便于2001年第5期上发表了日本著名学者沟口雄三、中国台湾学者陈光兴和大陆学者孙歌等三人关于中日历史记忆问题的笔谈,学术界相继出版了一批相关的专著和论文集,而更为大众化的反应则体现在大

* 本文的写作得到日本财团日中友好基金“日中青年历史研究者会议”项目的资助,谨此致谢。

沟口雄三:《创造日中间知识的共同空间》;陈光兴:《“日本想像”的差异》;孙歌《直面相互缠绕的历史》。以上三篇文章载于《读书》,2001年第5期,第3-26页。在2000年第3期的《读书》杂志上,也曾以卷首小特辑的形式发表了孙歌、小岛洁和沟口雄三关于“日中战争与中国革命”的讨论。这些文章及讨论是作为由中日双方的少数知识分子组成的“知识共同体对话”的成果而出现的。中方参加者之一孙歌称:“中日学者同时处理战争历史的话题并不鲜见,鲜见的是这组文章具有相当内在的相互补充和呼应的效果。”(孙歌:《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之两难》,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比如,王智新、刘琪:《揭开日本教科书问题的黑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苏智良:《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张海鹏等主编:《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三本著作均出版于2001年,并且都是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成书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日两国间的政治关系对该领域学术研究的影响。日本方面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如[日]藤原归一的《如何记忆战争》(讲谈社,2001年版)和船桥洋一主编的《目前如何面对历史问题》(岩波书店,2001年版)也都面世于2001年。

量网络评论和一些较为普及的报刊杂志上。

以“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南京大屠杀事件等为标志的中日历史问题主要是一个历史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涉及到历史学的方方面面,包括历史学的方法论和历史的本质,历史研究中政治判断和道德判断的位置,不同国家的国民对于他们之间某段相互缠绕的历史能否获得某种共同的理解等重要问题。但中日历史问题又不单单是一个历史问题,从这一问题所涉及到的对象、内容以及所产生的影响来看,它又是一个政治问题,特别是国际政治问题。虽然已经有学者提到了国际政治视角对于观察中日历史问题的重要性,但令人遗憾的是,直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国际政治或曰国际关系专家对这个问题的专门讨论却不多见。已有的讨论大多是在记者、文学批评家、作家和历史学家等人群中展开的。那么,现有的国际政治理论对理解久拖不决且时有激化的中日历史问题能够提供哪些见解呢?基于这些见解,在实践的层面,国际政治理论又能够为我们提供哪些启示呢?本文试图就这个课题作一点初步的尝试。

在此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国际政治学虽然是一门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学科,与大多数学科相比,自身的历史并不长,但发展到今天,其所包含的理论也已十分丰富,甚至可以说是庞杂。本文不拟也无力考察现有的各种国际政治理论与中日历史问题的相关性,而只是就其中笔者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层次分析与中日历史问题

严格说来,层次分析是国际政治研究中一种重要的分析方法,而不是一种理论。这种方法可以将人们对复杂的国际问题的解释系统化、条理化,从而使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更加清晰、全面和深入。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曾从人、国家和国际结构三个层次入手,对战争的原因这个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人们的问题进行了

中日历史问题,或者大而言之,中日关系问题,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微妙、敏感和引人注目的话题。就这一问题的讨论,并不只局限于中日关系“有事”时,尽管每当这个时候,相关的讨论常常会更加热烈。比如,在中国发行历史较长、影响较大、由外交部主管的国际问题普及性刊物《世界知识》近几年曾就中日关系问题组织读者进行了一系列讨论。讨论中各方的争论相当激烈,对日立场相对温和的日本问题专家冯昭奎甚至被某位网民称作是“媚日外交的急先锋”,而冯则引经据典,证明自己的立场符合中国三代领导集体的对日工作方针。相关内容参见《世界知识》,2000年第1、7、12、13、14期。2002年,《战略与管理》杂志第6期上刊登的马立诚的文章《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又在中国引起了关于中日关系问题的新一轮辩论。

杨大庆:《对于历史学家的挑战》,载[日]《思想》,No. 890,第84页。

参见孙歌:《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之两难》,第17-28页。

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藤原归一可能是一个少有的例外。藤原教授主要从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中对伦理的重新重视的角度出发来探讨中日历史问题的重要性,参见[日]《作为抑制的记忆——国际关系的伦理化及其悖论》,《国际问题》,2001年12月,No. 501,第30-41页。

有学者注意到,在日本,即便是在历史学家当中,对当前围绕中日历史问题发表意见的人开始的时候也不多见,只是在媒体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渐渐告一段落的时候,历史学家才开始参与进来。参见[日]三谷博:《日本的历史认识与近邻关系——思考教科书论争之未来》,《历史学研究》,2002年1月,No. 758,第37页。

经典性的考察，令人深受启发。

循着层次分析的思路，战后中日历史问题之所以久拖不决，并且直到今天仍在极大地制约着中日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其原因也大致可以从三个层次入手来进行分析：（1）国际体系的层次，即战后以来国际格局特别是东亚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变化；（2）国内政治的层次，即战后以来中国和日本国内的政治变迁，以及当前两国国内的政治状况；（3）人的层次，它包括两国国民的思维方式、心理状态和国民精神。

从国际体系的层次来看，二战后美苏之间冷战的爆发和国际格局的两极状态是使中日历史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战甫已结束，甚至在战争尚在进行的末期，美苏之间的矛盾便已显现。以1947年3月的“杜鲁门主义”和6月的“马歇尔计划”的推出为标志，美苏由战时盟友变为对手。面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美国迅速调整其对日占领政策，将日本作为其东亚战略的基石而予以大力扶植，其对日政策重点从在日本推行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改革转变为复兴日本经济，稳定国内政局。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定，中国正式加入东方阵营。接着，朝鲜战争爆发。“丢失中国”后的美国一手策划了的对日单独媾和的《旧金山和约》，将大陆中国排除在对日战后处理之外，随后又签定了《美日安保条约》，拉日本加入西方阵营。东亚国际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使得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从冷战初期开始便基本上为美苏斗争和东西方尖锐对峙的国际大背景所覆盖。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方面对其发动的战争没有进行彻底的反省，中日历史遗留问题也没有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而是潜伏下来，成为未来中日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隐患。

1970年代，东亚的国际政治格局由于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的改善而出现了重大变动。这种变动为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创造了外部条件。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由于双方领导人的努力，特别是由于当时中国领导人从长远考虑，宣布放弃基于国家立场的对日战争赔偿要求，使得历史问题在当时没有成为一个阻碍两国邦交正常化的主要障碍，但也没有在两国国民的层次上得到相应的清算。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两极格局的崩溃，中日历史问题进一步摆脱了国际体系的制约而日益显示出它自身的存在。

从国内政治层次来看，二战结束后不久，中国便陷于国共双方的内战，基本上无暇考虑对日本的战后处理问题；日本则处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的占领之下，国家破败凋敝，甚至一度丧失了主权，外交完全追随于美国。也就是说，在当时中日双方的政治日程表上并没有为两国解决历史问题留下多少空间。

此后，虽然中国和日本同处东亚，互为邻国，但却处于不同的阵营，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在“吉田路线”的指引下，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在1960年代和70年代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到80年代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济力量的增长往往伴随着大国心态、大国意识的出现，而这种心态和意识又与修正主义史观紧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谈判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围绕台湾问题而展开的；而在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过程中，双方的主要争执在于是否将针对苏联的“反霸条款”写进条约。

密相连。历史问题开始成为战后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1982年第一次“教科书事件”出现之后，特别是在中曾根内阁当政时期。

1982年中曾根康弘上台伊始，便声称要反省战后日本的“经济主义政治”，促进“国家日本的形成”，“造就新的具有自信心的日本人”。为此他抛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提出要反对“东京审判史观”，并于198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日公然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而随着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政坛的混乱和国民自信心的下降，这种以国家主义为核心的保守化趋势反而有增无减，以西尾干二、藤冈信胜等人为骨干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撰的《新日本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

从中国方面来说，在走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一段弯路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和综合国力实现了持续20余年的高速增长。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与日俱增。这样，在日本方面是急于寻找自信，而在中国方面则是自信空前增强，两相对峙，此前未得到很好解决的历史问题便很容易浮出水面，成为两国关系中的焦点。

就个人层次而言，常常被称为“同文同种”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日本有许多美德，比如说认真、勤劳、敬业、彬彬有礼、遵守秩序等等，但日本人的某些性格特点却被认为是阻碍了其历史问题的正确认识。譬如，有的学者认为，日本人崇尚实力与权威，蔑视弱者的民族特性很容易使其具有恃强凌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而其强调客观环境对是非判断的影响的道德相对主义以及对死者既往不咎的民族习惯，也不能不妨碍日本人对自己的侵略历史进行真诚的反思。即便是优点方面，对中日历史问题的解决也并不一定就能起到积极作用。譬如，日本学者重视考证、重视细节，这本来是其优点，但有的日本学者在研究南京大屠杀时却拘泥于考证南京大屠杀的数字和相关照片，而对大屠杀的性质则顾左右而言他。

就中国方面而言，日本在历史上曾长期受惠于中国文化，而日本在近代以来却以怨报德，其态度之傲慢与顽固，手段之野蛮与残忍，使得众多中国人在中日关系问题上有一种强烈的被害意识。这种强烈的被害意识甚至盖过了“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的中国古训。在学术研究方面，经过长期的努力，中国学者对于中日历史问题的研究应该说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和必要。例如，一位对华友好且治学相当严谨的日本学者便多次指出，中国方面公布的日本侵略给中国带来的3500万的人员伤亡数字的产生过程和其中所包含的死者、伤者及失踪者数字的细目并没有作出详细的说明。类似

转引自王希亮：《评日本当代历史修正主义》，《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第161页。

参见埃德温·赖肖尔、马里厄斯·詹森：《当今日本人：变化及其连续性》（孟胜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144页。

For example, see Hata Ikuhiko, "The Nanking Atrocities: Fact and Fable," *Japan Echo*, Vol. 25, No. 4 (August 1998), pp. 47-57.

参见张注洪：《抗战史料的整理与研究》，载郭德宏主编：《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5页；张蕴华等：《对1914-1945年中日关系的研究》，载李玉等主编：《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321页。

参见[日]石井明：《战后日中关系的轨迹》，《外交论坛》临时增刊，1997年10月号，第95-96页。

这样的思维方式和为学路径上的差异，经常使中日之间关于历史问题的对话不发生在同一个层面上，这无形中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

二、力量对比、安全困境与中日历史问题

长期以来，现实主义一直在国际政治思想传统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国家间的力量对比 (relative power) 则是现实主义理论建构中的核心要素之一。如上所述，90 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和中国力量的变化，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在中日两国当中都有抬头的趋势，两国之间的竞争意识和彼此抱有的戒心有所增强。中国对日本的一系列外交举措，如海湾战争后通过 PKO 法案、90 年代中后期强化美日同盟、与美国共同研发 TMD、通过“周边事态”法案、“9·11 事件”后迅速向印度洋派遣军舰实施对美支援等，都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在中国看来，日本似乎是在充分利用国际形势，一步步实现本国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计划。虽然这一过程本身并不一定就等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但由于历史问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许多中国人抱有这种担忧也并非不可理解。日本方面则对中国 1995 年的核试验和 1996 年在台湾海峡进行的军事演习表示不安。近些年来，“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有相当大的市场。日本的精英层普遍认为，中国的高速发展将会对日本的切身利益构成重大挑战。日本著名国际政治学家高坂正尧在去世之前曾对日本的年轻学者谈到，“中国问题将是 21 世纪前半叶的最大问题。”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迈克尔·格林 (Michael Green) 则认为，目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基本上是一种防备 (hedging) 与政治 - 经济交往同时进行的双重博弈。

从上述情况来看，中日关系似乎正在步入一种典型的国际政治学中所称的安全困境 (security dilemma)。安全困境理论在 1950 年代初由约翰·赫兹 (John Herz) 和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Herbert Butterfield) 分别提出，后经罗伯特·杰维斯 (Robert Jervis) 等学者的的发展，到现在已成为人们分析国际政治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的一个重要工具。其基本逻辑是，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一国为维护本国安全而采取的加强本国力量的防御性措施会被另一个国家看作是一种带有进攻性的威胁，后者由此而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加强自身的力量和安全，而前者基于此又认为自己最初所采取的行动是有理由的，结果虽然两国的基本目标都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安全，但最终双方都陷于一种更不安全的境地，困境由此而产生。

美国学者柯庆生 (Thomas Christensen) 认为，在当前东亚安全困境的加剧过程中，除了力量分布等人们通常所关注的因素之外，中日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安全困境一旦加剧，不但会破坏解决中日历史问题的气氛，而且也会影响到两国解

[日] 高坂正尧：《高坂正尧外交评论集》，中央公论社，1996 年版，第 263 页。

Michael Green, *Japan's Reluctant Realism*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 109.

John Herz,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 A Study in Theories and Reali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1);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 (London: Collins, 1951).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January 1978), pp. 167 - 213, esp. pp. 167 - 174.

Thomas Christensen, "China, the U. S. -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Spring 1999), p. 50.

决历史问题的意愿。其结果是历史问题的最终解决将变得更加遥遥无期。

只要国际政治仍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安全困境问题便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但国家在这一困境面前也不是无可选择的,一些因素,如军备竞赛、强化敌对性的同盟、媒体的失实和耸人听闻的宣传可以使安全困境得以加剧,而另一些因素,如建立多边安全框架及各个层次的定期协商机制、提高军事领域的透明度、加强经济和人员往来又可使安全困境得以缓和。明智的政治家的任务就在于对前者尽量加以控制,对后者尽量加以促成,使国家之间的关系向良性而不是向恶性方向发展。

中国如何冷静地面对日本的政治大国化趋势,日本如何平心静气地面对中国的全面崛起的趋势,如何缓和中日之间似乎正在缓慢加剧的安全困境,这是当前摆在中日两国政治家面前的核心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又无不与历史问题纠缠在一起,从而更加凸显出解决中日历史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

三、相互依存的悖论

1970年代,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和美国霸权地位的相对衰落,相互依存论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影响渐大。国家之间如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战争便可能令双方都得不偿失,因此相互依存有助于带来和平,这是国际政治中商业自由主义流派的一个核心论点。从战后法国和德国的和解的经验来看,彼此间相互依存的发展和一体化应该说是使两个昔日不共戴天的仇敌变成友好合作伙伴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舒曼等欧洲一体化设计者们的最初动机。尽管法德两国中的民族主义意识和相互竞争依然不能说不存在,但现在人们的确已很难设想两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了。

有法德和解的成功经验在先,不少学者也开始考虑将这种经验应用于中日关系当中,希望能通过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入手,逐步化解两国之间的历史积怨。但法德和解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联邦德国对其战争罪责的无条件承认和欧洲各国在历史问题上拥有大体上的共识。而这些东西却正是当前中日关系所缺乏的。尽管许多来自中日两国的学者呼吁中日携手推动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但中日经济合作能否走向深入,东亚经济共同体能否最终形成,在很大程度上看来仍取决于双方在历史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本想通过经济合作和相互依存来弥和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上的裂痕,到头来却得出一种似乎是倒置的因果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难题。

而且,相互依存同样还可能带来新的问题。由于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可能是不对称

代表性的文本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实际上,重视自由贸易和相互依存的思想在国际政治思想史中是源远流长的,18世纪的亚当·斯密和19世纪英国的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对此都多有论述,参见Arnold Wolfers and Laurence W. Martin, eds., *The Anglo-American Tradition in Foreign Affairs: Reading from Thomas More to Woodrow Wils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 87 - 90, 192 - 205.

除去强调贸易和相互依存的商业自由主义之外,当今自由主义理论阵营中还有强调“民主和平论”的共和自由主义和强调制度之作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近来有学者将此三者综合为“三角和平论”,参见Bruce Russett and John Oneal,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的，随着彼此交往的增多，出现矛盾的机会也会增多。前美国驻日本大使迈克尔·阿马科斯特曾将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美日之间激烈摩擦的原因归结为相互依存。而如今随着中日之间经济相互依存度的不断增加，出现经济摩擦、文化摩擦和感情摩擦的几率也会越来越大。这些问题与中日历史问题本无直接联系，但如果处理不好，却极易触及尚未愈合的历史伤疤，产生负面的连带效应。例如，中日贸易逆差的急剧扩大曾引发了 1985 年中国学生的大规模反日浪潮，当时学生喊出的“抵制日货”、“打倒日本军国主义”等口号，使人很容易联想到近代日本对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进入 21 世纪后中日之间接连出现了日航事件、三菱吉普车事件和中日围绕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而展开的贸易战，这是一种信号，预示着在相互依存的大背景下中日关系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向。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可能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后果，对于这一点，中日双方的政治家和广大国民应该有充分的认识。如何将那些在相互交往中不可避免要产生的冲突和纠纷置于可控制的范围内，在它们和中日历史问题之间建立起一道防火墙，并且尽量发挥相互依存的积极方面的作用，这是当前中日外交中亟待解决的一个课题。

四、建构主义与中日历史问题

建构主义是 80 年代后期以来国际关系领域新兴起的一个流派。关于建构主义是一种理论还是只是一种方法，目前国际政治学界尚在争论，但该流派近年来影响日益扩大却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相比，建构主义的突出特点是强调规范、认同和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认为国际政治既是一种物质结构，也是一种社会结构；重视集体记忆和国家利益及行为的社会建构等。建构主义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使它很自然地与中日历史问题找到了结合点。

当前的中日历史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两国国民的记忆、认识和观念方面的差异问题。对于日本侵略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那段历史，在日本除了极少数的极右翼分子之外，绝大多数日本人民还是承认的。日本政府也在多种场合下对此予以确认，并表示要进行深刻的反省。但在几乎所有的中国人看来，这种反省都是日本政府在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的一再要求下才作出的，并不代表一种自觉自愿、发自内心的真正的道歉（证据之一是，几乎每次日本领导人的道歉都伴随着一些日本高级官员关于历史问题的所谓“失言”）。对历史上自己所遭受的侵略和耻辱的惨痛的记忆在中国人的心中留下

参见迈克尔·阿马科斯特：《朋友还是对手》（于铁军、孙博红译，袁明校），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 - 20 页。

关于 1985 年中国的反日学生运动，参见 Allen S. Whiting, *China Eyes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66 - 79; 中国政府对这次运动的反应相当理性且耐人寻味，参见孙平化、刘德有：《珍惜艰难缔造的中日友好关系》，载《人民日报》，1985 年 10 月 27 日。

代表性的论著，参见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eter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日]大沼保昭：《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国际问题》，2001 年 12 月，No. 501，第 64 页。

Michael Green, *Japan's Reluctant Realism*, pp. 94 - 96.

了一道浓重的阴影，这使得他们对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十分敏感。而从日本方面来说，即便道歉是发自内心的，多数日本人的战争认识仍然附有这样一个注脚，那就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背景下，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扩张活动即便是侵略，那也只不过是效法其他欧美列强的做法，与这些国家相比，日本并非更不道德、更具侵略性和更加残忍。而且日本也在战争中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特别是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遭受原子弹攻击的国家。谈到对那场战争的刻骨铭心的记忆，中国这方面的标志性符号是南京大屠杀，而日本则是广岛和长崎。日本人作为战争加害者的意识远没有战争受害者的意识强烈。再者，在许多日本人看来，日本之所以战败，是败在美国人手下，而不是败在中国人手下。在这里所折射出的仍然是那种从甲午战争以来一直存在于许多日本人心中相对于中国人的优越感。一位长期研究中日关系史的中国学者据此担心，“今后中日关系不容乐观。”

从更深的层次上来讲，对中日历史问题的认识涉及到中日两国对近代史和现代史的总体认识。近代日本的国家 and 民族认同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才出现的，而日本作为列强的崛起恰恰是与近代中国的没落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日俄战争、满洲国之建立，日本人引以自豪和骄傲的近代历史大都包含着中国近代所蒙受的屈辱。从中国这方面来说，近现代民族主义的高扬也与抵抗日本的侵略有很大的关联。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以来反抗外国侵略所取得的第一次胜利，这次胜利大大加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也正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和八年抗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大部分中国人的民心，并为日后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解放后，抗日战争在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代以来中日之间这种相互缠绕的历史和彼此对立的历史观，使得两国国民在中日历史问题上的看法和观念出现了显著的歧异，从而也就决定了解决中日历史问题这一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既然主要的问题出在中日两国国民对战争的认识上的差异，那么最终的解决办法看来也只能来自于国民认识上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单靠政府出面便能带来的，而必须辅之以民间的渠道，在现阶段甚至要以民为主，通过加强两国知识界的交流和加深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为中日关系填加相互信任的土壤。在此过程中，各种非政府组织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在这方面，国际政治中目前正在兴起的“全球公民社会”理论对我们可能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结 论

上文中分别从层次分析、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等几个

汪向荣语，参见钟少华：《早年留日者谈日本》，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页。

日本方面的论述参见〔日〕冈义武：《国民的独立与国家理性》，载《冈义武著作集》（第六卷），岩波书店，1993年版，第241-308页；中国方面的权威论述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84-617页。

参见日本学者小熊英二关于日本民族概念形成过程的研究，〔日〕小熊英二：《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新曜社，1995年版。

角度出发对目前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从我们的分析来看，中日历史问题之所以久拖不决，而且近年来还有激化的趋势，其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考虑到目前中日两国的基本状况，未来一段时间内，历史问题仍将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棘手的问题。

关于解决或者说缓和中日历史问题的途径，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是不同的。现实主义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力量对比、安全困境和中日历史问题之间的关系。它所开出的药方是推行审慎的外交，要求两国政治家在处理涉及对方的问题时应十分慎重，要从大局出发，时刻牢记中日关系的特殊性和敏感性，避免感情用事。自由主义建议通过中日两国经济上的合作、东亚地区一体化和加强彼此间的合作机制来达成中日之间迟到的和解。随着中日之间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这种观点正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建议所面临的主要困难之处在于如何使两国首先摆脱历史问题对经济合作所形成的制约，以及如何避免相互依存所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建构主义希望通过大力开展民间外交，加强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努力在知识人之间，进而在普通国民之间建立起关于历史问题的共同的“话语空间”，形成共同的规范，在此基础上，循序渐进地解决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建议相比，建构主义所提供的解决办法似乎更长远，也更根本。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被认为是当今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几个主要的理论流派。单从理论上来看，各派理论之间似乎距离颇大，有的看上去简直就互不相容。但具体到实际问题当中，具体到真实的历史经验中，各种理论之间的互补性便显现出来。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中日历史问题这一个案当中，每一种理论都从不同角度帮助加深了我们对中日历史问题的理解。有的国际政治学者已经认识到，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中各种理论之间的激烈争吵已经产生了一种类似巴别塔的效应，这将阻碍国际问题研究的良性发展。如果说国际政治理论对我们理解中日历史问题有所助益的话，那么中日历史问题这一真实的存在反过来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关注理论和方法上的折中主义。

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两个重要的国家，中日关系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如何吸取上个世纪前半期两国间历史的悲惨教训，在努力保持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营建两国国民对待那段历史的共识，相互理解，彼此尊重，这对于使自己的国家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对于保持中日两国之间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和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今天我们仍在从各个角度探讨中日历史问题的意义之所在。

See Stephen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8), pp. 29 - 46.

Margaret G. Hermann, "One Field, Many Perspectives: Building the Foundations for Dialogu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2, No. 4 (1998), p. 606.

类似的观点，参见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Nobuo Okawara, "Japan, Asian - Pacific Security, and the Case for Analytical Eclectic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3 (Winter 2001/02), pp. 153 - 185.